

# 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吗

□ 翟学伟

**内容摘要** 社会科学及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已经出现了许多种声音。依据谢宇发表的《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中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现状、趋势,以及其在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及范式本土化的划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辨析,指出社会学本土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社会学如何面向自己的社会进行学理性的探索,而这一探索基于现有的社会学视角、理论和方法尚不能从学理上说清楚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式。如果社会学本土化能够得以实现,将为地方性知识与扩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作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 本土化 本土化的分类 地方性知识 本土方法 普世性

**作者** 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 210023)

《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上发表了谢宇教授的一篇论文,明确指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文中对一些中国学者所持有的“本土化”观点表示反对。我本不在其列,也对当下的类似讨论持有自己的看法,我尤其认为,有许多事情不是争论的问题,而是尝试去做的问题。不去尝试,只做修辞性辩论,看似热闹,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但由于此文发表后在一些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或“群”里转发,并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件社会学在中国如何发展的大事。如果对此没有争鸣,很容易被当成定论。据此,无论此文作者本希望谁来作答,我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学界关注此问题的学者,也是可以发表一些拙见的。

## 如何看待社会学本土化

读罢此篇论文,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社会学本土化问题,而是一个收藏界的现象。即如果一个收藏爱好者收藏到一件很不错的艺术品,可惜没名头或

无款,那无论如何是叫不出高价的。反之,如果一件艺术品上署有名人款,即便作品一般,也能卖出高价。这种名人效应表现在学术界也一样。有的时候有些观点是著名的或顶尖学者说的,那么无论说的是否在理,影响力就会不同凡响,而同样是这篇论文,换上了一个不知名学者或者博士生的名字,那只能说学界有这种看法,可以不必理会。我这里先用收藏来打比方,是想向读者表明,有关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需要有一个平等对话的前提,其含义是我们在讨论中不要去管谁说的,只考虑说得有没有道理即可。

我在讨论此话题之前,想先提供一下当下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种趋势,看看本土化在其间的发展情况。目前,处于中国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如果要想心安理得地保住他们的岗位,那么他们需要每年发表若干篇核心期刊的论文。但这并非关键,比较关键的是中国各大高校在衡量一个学者水平高低以及是否可以顺利晋级或者打败其竞争者的标准,要看他(或她)是否用英文在国际重要学术



刊物上发表若干篇论文。中国高校的衡量顺序是，能够发表英文学术刊物（其中要分区，本文这里不讨论）的是最好的学者，如果用中文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是次好的学者，发表于普通学术刊物的是不入流的学者。由此带来的一个激励效应是，面对这样水涨船高的态势，为了顺利站稳自己的教职，为了顺利晋级，需要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这一点在规模上使得一大批回国的学者以及一直在国内的学者纷纷将他们的学术视野转向了国际，包括国际性的议题、国际性的合作、国际学术的关注点等。现在我们想一想，国际学术期刊会关注本土化问题吗？会接受本土化的论文吗？估计很难。那么仅就这点，就不要担心什么本土化，它在当下科研激励机制下不成气候，更不会毁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而谢教授应该也不会去关心不成气候的事情吧。如果答案是国际期刊也会关心本土化，那也很奇怪，既然会，本土化又怎么是个伪问题呢？我再给一个事实，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想将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输入中国大陆。他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利用暑期联合办学，连续六年（1992—1997年）在中国不同的城市坚持不懈地招收中国大陆高校院所的年轻老师和研究生，进行本土化方面的系统授课，共培养了173名年轻学者。按照预期，这些年轻学者将在未来从事本土化研究，并在自己的岗位上讲授一些本土化成果或发表本土化的论文。请问，20多年下来了，这些学者在做本土化研究吗？几乎没有。我想说的是，谢教授是不是虚构了一个“伪问题”出来加以批评。或许，我们无论如何还是能从他论文的自身演绎中，看出中国社会学界的确是有本土化势头的。那好，这点正是本文想讨论的问题。

现在我再做一个设想，如果一些中国社会学家，比如老一辈中的林南或者与谢宇教授差不多岁数的边燕杰、赵鼎新、周雪光、阎云翔等，均已经成功进军国际社会学界，并在美国著名大学任教，甚至出任社会学系（或人类学系）主任，他们会思考社会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吗？虽然我不清楚他们的真实想法（其中有几位也发表过提倡本土化的论文）<sup>[1]</sup>，但我估计他们的选择性很大。或许以他们在主流社会学中取得的地位，提倡与不提倡本土化

并无大碍，本土化或许只是一种可能性（情怀）；它能不能成气候，与他们可以有关，也可以无关。但即便如此，从他们发表出来的研究成果来看，低限度地讲，他们均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社会的一些特征放入了他们的研究当中，或作为比较研究或直接以研究中国社会现象及问题在美国社会学界崭露头角，前者如林南建立的社会资本理论就带有对中国人情与关系现象的思考<sup>[2]</sup>，后者如边燕杰研究了中国社会在关系连带中看重强关系<sup>[3]</sup>、赵鼎新研究了社会运动及中国东周时代的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sup>[4]</sup>、周雪光研究了中国基于无组织的利益之上的集体行动<sup>[5]</sup>，以及阎云翔研究了中国乡土社会的送礼行为<sup>[6]</sup>等。另外，还有许多在美国社会学界打拼的中国年轻学子，既可以做一般社会学关注的课题，也可以选择中国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中国学者身处美国（或西方）社会学界，关心或不关心本土化，赞成或不赞成本土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有没有研究实力及其成果能否被国际社会学界所承认。但如果我们将这样的情形带回到中国社会学界来考量，或者说一些学成归来的学者在中国从事社会学研究，那么很多问题就发生了变化，因为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即有研究当下社会现实的意味。这将逼迫一个学者更加关注自己的社会，思考自己所学到的社会学如何应用于自己的社会现实。这些方面成为谢教授划分议题本土化与应用本土化的依据，是否合理我下面会讨论。

从晚清伊始，当中国学术界对社会学为何一无所知的时候，一些学成归国的中国社会学家们非常希望将这样一种学科传输给中国学术界。可100多年下来了，改革开放也40年了，中国高校的社会学课堂依然在乐此不疲地单向传输，而对身处的社会缺乏学术性思考，乃至于一打算思考，先想着西方理论是怎么说的。谢教授在文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只是认为这样的思考不是本土化的问题，可实际情况是本土化的构想正发生在其中。我们在讨论本土化的发端时始终不要忘记，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学者，不是一些在中国未留过洋的学者。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香港，提出社会学本土化的学者几乎是清一色地从欧美留学回国的社会科学家。我想，以他

们的见识，不应该去关心这样一个“伪问题”吧。

## 本土化可以这样分类吗

为了讨论清楚社会学本土化是不是个伪问题，谢教授对本土化在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分类。这样的分类给我的读后感是，如果去掉此文中的明确表态部分与结论部分，看不出本土化有什么不妥，也就是说如果拿掉明显的否定性或结论性的句子，我们把此文的标题改成“试论社会学本土化的展开”或“试论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也未尝不可。这样的读后感令我自己也很奇怪。谢教授一方面梳理了中国社会学界本土化在他分类中的情况，另一方面得出了它们是伪问题。此间的逻辑在哪里，文章交待得不很清楚。为何同一篇文章读后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思前想后，我感觉到谢教授对本土化的定义或许与从事本土化研究者对“本土化”的理解有所不同。因为定义不同，所以在谢教授看来本土化的伪问题其实不是本土化的问题，或者说谢教授把他对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偏向”定义为了本土化的问题。

比如，在谢教授“议题本土化”的讨论中，他的不满在于中国有些学者偏重提倡关注中国重大而现实的问题，进而质问难道那些不重大不现实的社会学问题就不需要思考？答案当然是也需要思考。如此一来，他认为议题本土化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样倡导下去，一些有价值的、微观的、有长期研究价值的课题就没有人做了。而我的看法是，目前更加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导向性不是来自社会学界内部，而是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课题指南，以及许多科研高校与院所将申报课题成功与否作为评定职称的条件。但无论是出于有学者出来呼吁还是课题导向，本土化都不是从这里开始讨论的。或者更明确地说，即使我们回到那些提倡研究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学者本人或者课题指南的设计者那里，他们也未必想过这些议题与本土化有什么关系，因为关注这些现实而重大的议题完全可以照着现有的社会科学路数去做，怎么扯上本土化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对热点、形势的看重，会导致社会学研究的现实主题不断调整，但学术积累很弱。我们不能依据当下研究主题的优先性，就

以为这是一个稳定而持续的学理性探索。形势与课题指南的不断变换，培养出了不少学者们随之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他们转换如此之快，也是因为现有的主流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任何主题的研究上都是通吃的，在理论解释上也是被当作普世的，再加上学术杂志的推波助澜，导致中国社会学的内在学理问题没法展开。这一现状非但不是本土化，反而搁置了本土化。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表现也看成是本土化的一种，那结局恰恰相反，它导致了本土化无法推进。同样的研究格局，为什么谢教授认为这是本土化惹的祸，而我却认为这么做会干扰本土化呢？说白了，我们对本土化的理解不一样。

再来看“应用本土化”的分类。谢教授在此分类中提到了情境，提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需要同中国现实之间有契合性。这一点曾是本土化的倡导者杨国枢先生经过反复酝酿，对本土化提出的一个标准<sup>[7]</sup>。他“强调本土化取向的研究必须具有高度的（或足够的）本土契合性，而经由具有高度本土契合性的研究所发展及建立的知识体系，才算是本土心理学”<sup>[8]</sup>。为何要用契合性来作为衡量本土化的一个标准？因为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研究的一大弊端，就是随意照搬西方的各种理论，最终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没有契合起来。当下许多研究被有学之士斥为“两张皮”，就是指这样随意处置外来理论与自己研究之间的状况。本土化学者的愿望是，如果理论与现实之间有了很好的契合度，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本土化研究。可在这一点上，谢教授又认为这不算是本土化，而是一个优秀的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样一来，还是出现了本土化提倡者认定的本土化，到了谢教授那里却不是本土化。

再者，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分类——“范式本土化”。范式如果不是被学界滥用的话，在库恩的科学史研究中是有明确的含义的。这个含义的基本意向均指科学内部的革命或研究方式方法的转换，而不是说有一种范式跑到学科外部去了。在这样的含义中，我想目前中国社会学界应该无人会提出一种社会学之外的本土范式，而且谢教授还想象了如果中国社会学用了这样的范式，就会脱离现有的社会科学，连逻辑都没有了。我相信，大多数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学家都不会也不敢有这样的想法。

在逻辑思维及理性思维的问题上，西方的整个自然科学与社会学都源自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而发端于现代科学的诞生。的确，这样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是缺乏的，因此国学研究如果沿着自身的思维方式前行，应该说是脱离现有的社会科学的，当然也是脱离社会学的。但在中国，真正提倡本土化的学者没有想在社会科学之外另设学科，或许有极个别非社会学界的学者假借社会学之名提出过回归传统文化之类，但这种个别的声音从来没有影响到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我们不排除这些人对社会学的理解比较随意，想当然地、心血来潮地写一些不入流的文章。但我想谢教授指的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影响力。而事实上，谢教授在此分类中所引的学者是中国台湾的叶启政教授，他需要推论的是因为叶教授在书中曾提及中国传统中“直觉体验”和“冥想演绎”，这样下去就会产生类似的本土社会学。查阅叶启政的这部分讨论，他在此部分想表明的是中国的这一传统思维没有阻挡得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长驱直入，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化中接受了它们。换句话说，这一部分的论述之内在逻辑是，提倡本土化的学者们在讨论中国社会学的西化历程中，没有想用这样的思维来构建本土化。而他的主张反而是，“‘本土化’基本上必须在继续接纳外来西方学术思想的条件下来进行，才有意义，也才可行的”<sup>[9]</sup>。社会学本土化当然是以社会学为前提的，是在社会学的框架下的。这个框架包括了科学哲学基础、逻辑推理、规范的经验研究等。可见，中国社会学界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本土化类型，谢教授对此的批评并没有落到实处。

由此，我认为谢教授的这三个分类只是为他心中想得到的答案在设靶子。只可惜这样的分类即使得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伪问题的结论，也属虚构，未触及本土化的真问题。更为吊诡的是，他的这种分类不但没有让我们看到社会学本土化实情，反倒看到了依据这样的分类，本土化尚未到来。

### 本土化原本是学理性的探讨

经过以上的讨论，我发现谢教授可能还不太了解社会学本土化的本意。以我自己多少经历了社会

学在改革开放中的恢复与重建过程来看，在中国大陆提倡本土化的学者很少，做的人更少。原先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都比较回避这个问题，谈“中国特色的”有，谈“自主性”的有，谈“话语体系建设的”有，甚至有学者将类似的研究宁可说成“历史社会学”，也拒绝说是本土化。要说比较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老一辈的是费孝通的“文化自觉”<sup>[10]</sup>，晚一辈的是郑杭生及其弟子<sup>[11]</sup>以及其他零星学者。好多年前，山东大学出版社还出过一本《社会学中国化：中国大陆学者的讨论》<sup>[12]</sup>的集子，但此书在学界没有什么反响。从谢教授文中所引述的文章来看，情况也的确如此。即他文中所列举到的一些本土化观点都是在最近几年发表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最近几年会有一些“本土化”的声音呢？因为近十多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之口号。为了落实这一口号，近来便有了“四个自信”，其表现之一就是中国学术研究需要提升，要有自己的创新。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学术创新的路径就是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也就是说，因为这一宏观背景催生了学界出现了类似讨论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吁。但谢教授必须要意识到的是，这只是一个类似本土化的外在动因，而且政府对学术界提出的要求比学者自己目标要宏大得多。原本本土化的研究只求在社会学中建立一些本土的概念、理论或地方知识，并得到社会学界的认可，即已很满足了，可现在还需要建立一个话语体系。我研究“关系”“人情”和“面子”近30年，自己都不清楚这些概念在不在这样的体系中，只知道这些概念是本土社会学可以贡献给国际社会学的。比如，何友晖曾写过论文指出行为科学中亚洲文化的六个关键概念，来自中国的就有三个，即“孝”“仁”和“面子”<sup>[13]</sup>。又比如，面子是吉登斯撰写的《社会学导论》中的一节<sup>[14]</sup>，以及戈夫曼的理论也是从面子起步的，还有许多社会学和人类学家都研究过中国人的人情和送礼的现象，以及国际社会科学界逐渐接受了 *guanxi* 这一概念等。可见，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未来的工作。这样的本土化会是什么样子，目前还无从知晓。我只能从广义上说，姑且我们这里可以把特色与话语体系算作本土化的讨

论，但如果这是一个伪问题，那么还需要论证；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那么就可以试行，因为这项工程才开始启动，处于“呐喊”阶段，现在说什么都为时过早。

其实我眼中的本土化是比较狭义的，它从头至尾只是一个学理性的讨论。这一含义的始作俑者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留洋学者，但今日引发的讨论则要归功于中国台湾社会科学家们的觉醒。虽说早期留洋学者与中国台港学者都提出了中国化（本土化）的问题，但我的感觉只是两代人的动机很接近，并无承续性。台港学者的本土化意识来自于他们在教研中的觉悟。本土化一开始用过中国化，后来改成了本土化。为何要这样改？理由是中国化只强调了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努力，而本土化可以突出不同社会与文化区域的社会科学家们都来做类似的工作。此时此刻，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便成为本土化中的一支。其提出此问题的意识，来自于一些从欧美回来的学者在教学和研究中的强烈感受，即不能总是在课堂上教授美国课本上的内容，也不能在研究中一味重复验证西方的理论。中国社会有许多需要讨论的现象及其问题不在课本中，但这些现象及其问题对认识中国人的生活是重要的，对其他社会的人或许是不重要的；反过来说，其他社会中重要的也许对中国人来说是不重要的。但我们不能说，目前课本上说重要的就是重要的，也不能说欧美社会学家说重要的就是重要的。当然，按照谢教授的观点，即使不重要的也可以研究，可是如果没有本土化的倡导，便无所谓重不重要，只是一味地照抄照搬。而更加令人焦虑的是，中国学者拿着这些照搬过来的理论和概念并没有说清楚自己的社会。这点引发的思考是，每一种社会的生态、历史、民族、文化、信仰、价值观等都在构筑自己的社会，也会让自己社会的一些重要议题凸显出来。虽然谢教授本人在文中也认可这些差异，他自己的研究也讨论这些差异，也希望有比较研究，只是他不把这样的研究看成是社会学的本土化。甚至可以说，我们无需本土化的社会学也一样可以研究这些问题及其差异。但本土化研究不满足于比较，也不满足于用现成的理论解释比较中存在的差异或只对现有理论做点补充，而希望立足于本土研究获得新的学理

性的见解。

这里就是本土化研究成立与否的一个重要分界点。这一分界点不在于文化情感，也不单纯靠自信，而是需要问一问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是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样的本土社会。如果答案是可以，那么本土化当然是多余的，可惜的是，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尚有不足，还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这里，我们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认识误区，这就是社会学怎么说也是社会科学。那么既然是科学研究，怎么会有本土的问题？也即，我们完全可以说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及问题都可以用社会科学来研究，由此进一步推断，为什么要去区分什么本土不本土的问题。是的，站在“科学研究”这一大旗下居高临下地看，本土化似乎有伪命题之嫌，但这里的科学内涵指的是自然科学而非社会科学。本土化为不少学者接受，是因为现实的社会构成与人的行为还不能用自然科学传递给社会科学的方式方法讨论清楚。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我们不能简单而武断地从科学视角来俯视社会学研究，而是要进入到社会学内部去看一看这样的学科究竟科学到了什么程度（这让我联想到了“索卡尔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深度讨论）？且不说与社会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经济学和心理学够不够科学，就拿社会学中的统计学与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心理学的实验相比，社会学也有继续努力的余地，而在接近了经济学或者心理学之后，其科学性又如何？所以社会学是否科学地研究了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肯定的回答，而是一个期待的回答。

目前社会学的理论不少，我们能够说出什么样的社会学理论是符合科学的？恐怕许多理论的个别之处及结论能够大体符合科学要求。据此也有人认为，社会科学中的牛顿时代还没有到来。我想，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实现自然科学建立起来的条件和标准，是因为人的社会永远有意识、伦理、价值及意义的问题，它们往往与事实混合在一起而不容易剥离，或者也有学者认为根本没有剥离的必要，因为人或社会的预设背后就有价值判断。显然，在研究人和社会的问题上，社会学中的人文主义是去不掉的。只能说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的学者有意回避或忽略这一点罢了，或者说在对社会学研究如何展开进

行定义的时候将这部分切掉，即认定没有数据的支持皆不能成为社会学之研究。但这些都不是一个结论，只是一种讨论。这点即使在西方也有现象学、解释学、批判理论、后现代、后殖民、后实证主义或者批判实在论等。以对社会的描述与预测而论，实证主义社会学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就，但以社会学的理论思考而言则非常多元化，即使一些非实证的理论也一直占据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大部分。当然，因为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作出了许多很好的研究成果，导致中国社会的学者们所学习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就是实证研究。更进一步说，中国台港的社会心理学家们在本土化的引领下所做的大多数研究也是实证研究，做现象学的极少，而做批判理论的几乎只为一二。由此事实表明，即使一些留洋回来的学者提倡本土化，但他们所进行的研究还是以实证研究为主。与不做本土化相比，他们只不过把以往的套用、模仿与验证性研究转化为对本土概念所进行的定量研究，比如孝道<sup>[15]</sup>、缘分<sup>[16]</sup>、中庸<sup>[17]</sup>、面子<sup>[18]</sup>，有个别的是定性研究，极少的是理论方面的探讨<sup>[19]</sup>，几乎没有方法上的增进。这点足以构成本土化研究只能停留于理论建构或对本土概念做实证的瓶颈，而很难再进行下去。这一现象也恰恰说明了本土化的研究进程是不够的，而不是进展顺利、成就辉煌的。

所谓本土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希望在中国学习和研究社会学的学者不要止步于学习尤其是模仿，更不要一做研究马上就想着照搬或者套用什么样的西方理论，应该参与到社会学的发展与拓展中去。或许，不赞同本土化的学者会认为，参与就参与，干嘛要本土化呢？我这里所讲的参与可能会出现两种路径：第一种是谢教授所希望看到的那种主流性的参与，比如一些学者能够在社会学的某一个特定领域作出一定的贡献，也包括将中国社会某特定研究放入一般社会学研究去比较和讨论。只是这样的贡献对个别优秀学者而言是可能的，此人的学术功力、学术训练、研究能力和所处学术环境及位置等都将成就此人的学术原创。第二种路径便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及文化开始。这样的参与最容易发生在学成归来的学者当中。如果一个中国学者长期待在美国做研究，那么他所熟悉的学术环境与氛围

都是美国的，由此产生的眼界也是国际化的。而如果一个中国学者长期待在中国做研究，那么他会更加关注于他身边的问题，我想这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家们都会自然产生的情怀。

### 本土化研究中的问题及其出路

实证主义、现象学、解释学、批判理论、后现代、后殖民、后实证主义或者批判实在论等都是在西方社会科学内部发生的。一种最为理想的结果是，没有本土化的提倡，中国学者也一样可以参与其间，创立一种看社会与解读社会的理论视角或者新范式。只是延续这一发展脉络，一个学者要想有所成就，撇开个人智力因素不论，首先应该浸淫于西方文明，精通其语言并有非常深厚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积淀。许多西方人提出的社会学理论看上去是普遍性的，但作为各个不同的理论面向，绝大多数都具有西方文化的根源性。由此，一个要想直接在社会学研究中贡献类似这样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学者，应该具有对西方文明的高度的认同与反思能力。如果我们认为社会学本身也无所谓东方西方，只不过它的源头在西方罢了，那么中国学者能不能也对社会学有所贡献？如果说目前的贡献主要都是西方人提供的，那么中国人能不能也提供一些？此时，像谢教授这样走入主流社会学前沿并作出贡献的是一种可能，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是从中华文明中获得理论或方法论上的启发，比如赵鼎新就希望从道家学说中看到社会学研究中的另一种“时间观”<sup>[20]</sup>，又比如戈夫曼从面子研究中获得启发来建构其戏剧理论<sup>[21]</sup>，以及马斯洛也从道家中受到影响去建立其心理学的整体观<sup>[22]</sup>等。无论如何，社会科学及社会学研究是开放的，理论是可以竞争的。费孝通说过的“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否可以同常人方法学对接，可以研究；或是下一步能否以儒家思想来反思符号互动论，以及中国的“家国同构”是否消解了社会学中微观与宏观的隔离，都是一些非常有趣而重要的社会学议题。如果这方面的研究不仅仅是做个比较，而且推动了社会学的新思路、新理论、新方法等，为什么不可以接纳，而是抵触？

如上所述，社会学本土化自身所遭遇的最大问

题不是上面讨论到的理论问题，而是方法问题，尽管中国学者在理论建构方面也很薄弱。但更为严峻的是，本土的理论或者本土的概念如果没有本土的方法，就会使一些理论观点无法落实，在经验研究上得不到验证。也就是说，有关社会学研究普遍性问题的焦点往往不在理论方面，而是在方法方面。这点成为熟悉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者质疑本土化是否必要和可能的理由。就理论建构的能力而言，从中国传统思维直至眼下大学教师在指导学生写论文的实际中来看，很多论述方式都反映出了中国人的逻辑思维相对薄弱。但这是一个可以学习和训练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样的不足。同样，目前在社会学界已从事规范研究工作的学者，也多少具备了理论思考的能力。但是，本土化实现的最大瓶颈就是方法上的限制。谢教授提出的伪问题其实不伪，只是方法有待突破。如果说概念的原创性，中国社会学界津津乐道的费老的“差序格局”也几十年了，但如何从事差序格局的经验研究？也许能做的就是定量和定性。而我认为，无论定量或定性，尚不能传达出从儒家伦理延续到潘光旦的“伦”的社会学研究，再到形成费老“差序格局”概念的精义。<sup>[23]</sup> 谢教授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似乎想说定性研究是本土化学者所提倡的，但实际情况是这两种方法在研究上的任务不同。我不清楚本土化提倡者中有没有刻意提倡定性研究的学者，但作为一种可能潜在的意见或许同本土化需要嫁接的中国传统资源有关，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是人文传统，而缺少由古希腊传承下来的逻辑和数理传统。如果只是从这一方面来看，从中国传统中寻求到的资源最大可能在于非实证化倾向，由此也就最容易同现象学、解释学及理解社会学所派生出来的方法相接近。或许，我们这里不妨反过来思考一下，如果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现象学社会学诞生于中国，我们会以什么态度对待它们？如果戏剧理论来自中国社会学家自己对面子研究的启示，我们还会接受它，并将其放入现有的社会学理论中去吗？好在它们来自西方。如果我们的回答是它们即使出现在中国也能够被看好，那么社会学本土化为什么不能在人文取向上也有所成就？或者说，是不是因为费老的一

些想法与其有相似之处，就不再需要发展本土理论和方法了？那么，如果说有些中国学术中的理论或方法根苗在西方就是没找到对接点，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发展与建立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了？讨论至此，看来自信还真的很重要。可见，以开放性而论，本土化的社会学如果可以发展成一套研究社会的有效的人文方法，是可以接受的。只可惜，没有看到有相关的研究。但可以肯定地说，利用中国传统资源而建立的本土方法属于本土化的研究。当我们敬佩哈贝马斯、欣赏福柯、赞扬布迪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是欧洲的文化资源，或者说是德国或法国的文化传统孕育出了这样杰出的社会学家？同样，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以为天经地义的社会学实证研究的背后有美国实用主义的传统？

至此，本土化研究的基本涵义应该含有三个层面：一是（我自己长期一贯坚持的）社会学本土化是在符合科学哲学基本原则与框架的前提下而建立的社会学方面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如何发生，将受到该地方的生态、历史、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形塑，其中尤为重要之处是找到中国文化（包括儒道释）对人世间的预设及其推论以及所能展现出来的生活准则，并求得经验性的研究和检验。必须指出的是，在科学哲学指引下的社会科学及社会学的本土化不是国学知识体系的回潮<sup>[24]</sup>，除非后者能够满足于科学哲学的条件并愿意采取现代科学的范式和方法进行逻辑演绎和论证。比如如何研究“人伦”，按此标准衡量，国学与社会学本土化对此有着根本性差异。当然，我们知道，科学哲学自身也处于争论和变化中，也不排除中国哲学对科学哲学有所贡献，而社会学本土化也将为此寻求出路。二是社会学本土化所建立的地方性知识，包括视角、理论、概念、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等，首先应具有对当地民众社会生活现象的解释力乃至预测力。就当下中国社会学的学习情况来看，从西方业已建立的社会学传统中获得知识更新，属于一种非本土化的创新。这是所有社会学研究者都可以尝试的。如果一种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来自于本土资源的启用与演化，这样的创新便是本土化的创新。三是社会学本土化不能仅满足于地方知识的建立，更不能也不会将自己独立于社会学学科之外，而是希望把自

已在地方性知识中发现或抽象出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国际社会学，或融入主流社会学，或提出对社会学研究的新认识与新途径，由此而有机会以一种学派或者理论范式应用于其他社会，以作为普世性的检验。我们无论从上述提及的借鉴中国思想而产生的社会学理论来讲，还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去挖掘本土资源，都会发现在中国社会讨论的议题尤其是建立的概念，其实也同西方概念一样，都具有广泛的延展性。我本人多次被人追问的问题是：“难道美国人不搞关系”“难道外国人不讲面子”。而且询问人往往自问自答：“都有。”那么好，都有的话，中国学者不能建立起“关系”的理论吗？不能有“面子”的理论吗？为什么中国人本可以率先建立的关系理论没人敢做，非要等到格兰若维特提出了“强关系”和“弱关系”才有一片喝彩声，然后就是连篇累牍的“强关系”研究？如果说美国学者提出一个“强弱关系”分类可以被中国社会学人泛滥地使用，同样一个中国社会学家建立的关系理论或面子理论也是可以用于其他社会的。所谓本土化的社会学，不是说凡是由中国学者建立起来的理论概念就被限于研究中国社会，而是说立足于中国社会建立起来的本土概念及理论也一样可以解释其他社会，当然这里面还是存在一个文化重点的问题。这就是我对普世性的理解。

总结本文的基本观点是，首先，社会学本土化至少在中国大陆因学术全球化的发生，从未有过明显的本土化趋向。近来发生的一些类似表述，是政府推动和学者响应的结果，但因学理部分讨论不充分，前景如何目前尚无法预测。其次，关于所谓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与范式本土化的分类不符合中国社会学界的实际状况。即使作为研究上的分类本身无可厚非，但以此判断社会学本土化是伪问题，也是误读了本土化的原有之意，把不是本土化的表现说成了本土化。最后，社会学自身作为一门学科，其内部的视角、理论与方法是多元性的，也是所有社会学研究者可以共同参与的一项学术事业。中国社会学界单方面的学习与模仿，无助于这样的学科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回应自己社会发生的纷繁现象和问题。为了对社会学有所贡献，从个人的天赋、能力和训练为社会学作出贡献，或者从自身

的文化传统中寻求资源为社会学作出贡献，只是道路不同。目标是趋同的，即都希望在学理上扩展或更新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式，以此寻求到对一般社会或者特定社会的更好解释路径与问题解决之道。

#### 参考文献：

- [1] 林南. 社会学中国化的下一步. 社会学研究, 1986(1); 边燕杰. 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 社会学研究, 2017(5); 赵鼎新. 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 社会学研究, 2018(1).
- [2] 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 Bian, Yanjie.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
- [4] 赵鼎新, 夏江旗译. 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5] Zhou, Xueguang. 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3, 58.
- [6] Yan, Yunxiang. *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7] 杨国枢. 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 本土心理学研究, 1993(1).
- [8] 杨国枢. 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关问题. 本土心理学研究, 1997(8).
- [9] 叶启政. 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70.
- [10]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3).
- [11] 郑杭生、王万俊. 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0; 洪大用. 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质与方向. 社会学研究, 2018(1).
- [12] 徐经泽. 社会学中国化: 中国大陆学者的讨论.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
- [13] Ho, D. Y. F. Asian concepts in behavioral science. *Psychologia*, 1982, 25.



[14] 安东尼·吉登斯, 赵旭东等译. 社会学(第4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04.

[15] 杨国枢. 中国人孝道的概念分析. 杨国枢. 中国人的心理. 台北: 桂冠图书公司, 1988; 叶光辉、杨国枢. 中国人的孝道: 心理学的分析. 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 2008.

[16] 杨国枢. 中国人之缘的观念与功能. 杨国枢. 中国人的心理. 台北: 桂冠图书公司, 1988; 李沛良. 社会科学与本土概念: 以医缘为例. 杨国枢、文崇一.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82.

[17] 杨中芳. 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探研的初步进展. 本土心理学研究, 2010(34).

[18] Ho, D. Y. F. On the concept of f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 81; 朱瑞玲. “面子”的压力及其因应行为. 杨国枢、黄光国.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1989). 台北: 桂冠图书公司, 1991.

[19] 杨国枢. 华人心理的本土化研究. 台北: 桂冠图

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叶启政. 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叶启政. 迈向修养社会学. 台北: 三民书局, 2008; 黄光国. 儒家关系主义: 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 台北: 台湾大学出版社, 2005.

[20] 赵鼎新. 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 社会学研究, 2018(1).

[21] Goffman, E. On face-work: 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 *Psychiatry*, 1955, 18.

[22] 马斯洛, 林方译. 科学心理学.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82-87.

[23] 翟学伟. 伦: 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 社会, 2016(5).

[24] 翟学伟. 心理学本土化之我见. 翟学伟.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翟学伟. 试论本土性研究的正当性与可行性. 管理学报, 2017(5).

编辑 李梅

(上接 48 页)

[5] [6] 韦伯. 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 广西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40、9.

[7] 韦伯. 法律社会学. 广西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31.

[8] 徐勇、邓大才, 李俄宪主译. 满铁农村调查.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3.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53.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7.

[11] 列宁选集(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512.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

[13] 白雪娇. 分形同气: 农工并举之族的裂变与整合——粤北福岭村调查. 徐勇、邓大才主编. 中国农村调查(总第4卷·村庄类第3卷·华南区域第3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15—116.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69.

[15]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228—229.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29—330.

[17] 徐勇. 中国农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 中国社会科学, 2013(8).

[18] 徐勇. 祖赋人权: 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 2018(1).

[19] 徐勇. 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论西方话语中的“东方专制主义”. 学术月刊, 2012(4); 徐勇. 从中国事实看“东方专制论”的限度——兼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政治论断的辨析与补充. 政治学研究, 2017(4).

[20] 徐勇. 用中国事实定义中国政治——基于“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的分析框架. 河南社会科学, 2018(3).

[2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 2016. 5. 18.

编辑 杜运泉